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

文化·传媒·全球化

刘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

文化·传媒·全球化

刘 康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媒·全球化 / 刘康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ISBN 978-7-305-04854-8

I. 文... II. 刘... III. 现代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D6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150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书 名 文化·传媒·全球化
作 者 [美]刘 康
责任编辑 赵 庆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97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978-7-305-04854-8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在当今世界大开放的新格局中,“全球化”这个名词不啻是经济、社会范畴内的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发展的需要。表现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领域的“全球化”,则呈现为东西方文化的互渗互动、融会贯通,即以全新的学术视野,“打通”的学术眼光,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渗透、比较研究中抽绎出中西学术的核心价值,并在学术规范、方式方法上衡之一种共通的学术标准,使学术研究不再围囿于“象牙塔”,或是圈子内激赏把玩的“妙品”,而应该使学术研究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普世”的学术价值。

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走在了前列。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了基础的中国文化教育,后又留学欧美,并在欧、美著名大学内从事文化教育与研究工作。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他们并没有迷失自我。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吸收西方的文化涵养,一方面他们一样倾情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利用熟谙两种语言的学科背景优势,“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从事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们有时就像一群学术研究的“候鸟”,穿梭往返两大洲之间,利用他们的学术假期和会议时间与国内同行作广泛的学术交流,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创见的学术成果。而这正是我们出版这套“海外华人学者论丛”的缘由。

本论丛收集的大都是这些海外学者近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题材多样,研究形式不拘一格。他们有的文章已在国内外发表出版过,有的则首次在国内出版。我们从审读中觉得,他们的学术视野广阔,学术架构清晰,研究问题敏锐,研究思路富有前瞻性,有些提出了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尤其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术规范的精准操作上,给国内的学术界吹来了一缕清风,我们希望这一缕清风能吹皱起国内学术界的一片涟漪。

学术无国界。在这个存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我们突破这种“霸权”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彰显我们东方的学术价值,以撇清西方大众对我们文化认知与解读上的种种误区。我们需要更多的李约瑟、费正清、杜维明、余英时们,我们需要一批东方学术的“传道者”。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些海外学者们提供一个学术出版的平台,我们乐于充当这样的文化支撑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2日

序 言

1983 年我到美国留学,至今已有二十三载。这二十多年来正是中国和世界经历巨变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短短一代人的光阴里,几乎跨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好几个阶段,实现了高度的时间浓缩。与此同时,在空间上也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北京 2008 年将举办的奥运会和中国宇航员接二连三地进入宇宙空间,均标志着中国在社会意义上的国际空间和物理意义上的宇宙空间均达到了新的阶段。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与全球化同步,尤其突出了时空同时在浓缩与扩张这一全球化的重要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在全球化格局下展开,但中国并未成为现代化国家。中科院现代化战略研究组 2006 年 2 月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6》,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尚有 80 年的差距,在经济上则有 100 年的差距。对于像我这样有幸在中国与美国、西方国家来回穿梭,学习、工作、生活的人来说,对于中国的巨变和差距这两方面,都有切身体验。作为人文社科学者,我对于中国文化领域的变化感受尤为强烈。

本书辑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近十年来的一些文章,记录了我自己对中国文化变迁的感受,也反映了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一些转变。这些感受和转变虽然都是些个人的、相当主观性的东西,但从某个侧面也能透露出更宽阔一点的意义。人文社科研究现在更加强调跨学科、多学科对话,更加注重主体间的交流。作为研究者和参与者,个人的主观性必然进入了与更多人的主体间交流,这些人既包括了学术、知识界、文化与传媒领域的同行,也包括了更多的关心相同话题的读者。这样的对话与交流使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关注更加丰富多彩,宏阔多元。这些年来写下不少英文与中文的文字,虽无学术价值,更没有值得一提的观点和见地,但毕竟是个人认真思考的结果,多少表现了我这代 1978 年上大学,后留学国外,并在外长期居留的一批人的想法。

我是学文学的出身,古人云“诗无达诂”,对我影响很深。近代西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解释学派哲人,亦强调对人类生活研究的主观性唯有对话、交



流、沟通,方能通达(即主体间性)。多年来,对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由怀疑到摒弃,到彻底服膺于解释学意义上的主体间对话为人文社科的坦途,其实并非易事。从中国的“普遍真理论”来到西方,遇到的是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占主导的思维框架,提倡的是另一种“普遍真理”。这种建立在数学模式和统计、实证数据基础上的学术理念,也主导了西方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传播学在学术模式上趋于前三者,也是以量化实证研究优先(主要可以从研究项目得到赞助经费的机会和数额中看出)。而我所学的人文(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领域,则与科学实证的主流南辕北辙。与自然科学和工程难以对话倒也罢(当然也有学理工科的人不满人文类激进左翼的后现代术语堆砌,而故意恶作剧的例子,如美国著名左翼学刊《社会文本》杂志1996年发表的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阿兰·索卡尔的“伪后现代物理学论文”的丑闻)。在美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两大统属文科(liberal arts)的门类,原来也基本上各立山头,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跨学科对话、交流乃至整合如何进行?单纯从学术上来讲,这很令人困扰。学术也不仅仅是个学问该怎么做的问题,首先涉及到研究课题、项目、经费等实际问题,想必学术同仁均深有体会。近几年来我的学术角色有所转变。由文学、美学等文本解读和思辨的领域,游移到传媒、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等范畴,以致到对学术规范与机构的思考。对我来说,这种转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从单纯的个人阅读和写作转向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团队合作,另一方面则从人文的领域游离到更多属于社会科学的采邑。这种转变源于自己内在的冲动和愿望,也直接受到研究对象和周边学术环境的很大影响。总体上这个转变让我受益匪浅,视野大大开阔。但也越来越有危机感,对多学科整合的模式,越来越觉得难以施行。开始由文学理论、美学领域起步的(国内称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同行,近年来都开始关注文化研究。许多文学专业的同行(尤其在美国)现在多转而研究电影。一时间,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电影成为美国现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不过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仍然是文本解读式的,在人文领域里面转些弯子,不至于出圈子太远。但是像新闻传媒这样的领域,涉及经济、社会与政治学的许多理念和规范,如何与人文学科接轨对话?如果仍然坚持个人文本解读的方式,如何理解把握传媒受众与市场的作用?如何认识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运行,作为公共产品的政治与社会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传媒作为国家竞争力中的“软实力”,在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应该如何分析理解?

西方学术的现状是,后现代主义在人文学科从边缘到中兴,已渐成老生

常谈。谁不怀疑批判实证主义便是过时的老保守,成就不了明星。在社会科学领域,统计、量化和抽样调查等实证研究模式稳居核心与主流。谁讲后现代就是赶时髦的过激派,只好叨陪末座。像我感兴趣的文化研究、传媒研究,以及最后归结到的核心的核心即中国研究,则成为各山头各学派争强斗法的擂台,当然其中谁财大气粗、谁高喉大噪,依然要根据各自背后的学科和派别在大气候大氛围的实力和特征来说话。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研究乃是居无定所,似游方僧四处化缘的“游击队”,并不形成井然有序、尊卑有别的学科规范和机构平台(如美国大学里至今未有“文化研究系”或“美国文化研究学会”出现)。传媒的特点是强烈的实践应用性。因为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自身缺少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主流大众传播学主要取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对于后现代主义传播学以及具强烈文化研究色彩的“传媒研究(Media Studies)”反而倒有很大包容性。至于中国研究,本属于冷战时代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和传统“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里面汉学(Sinology)部分。冷战结束后,区域研究在美国越来越受冷淡,传统汉学也分崩离析,中国研究也就形不成什么气候了。但实际上美国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每年的年会依然庞大,动辄好几千人参加。各学科招聘教授,也依然按区域或国别专业定向。区域研究百足未僵,根据美国的实用需要,倒有着此消彼长的格局。譬如一向受冷落的阿拉伯中东研究,从9·11之后颇受青睐。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已经由遥远神秘落后的东方古国,成为今天无所不在的现实存在。中文从十几年前的“稀少讲授的语言”(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跟印地语、希伯来语、韩语、斯瓦西里语等一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大学里第三、第四位选修的外语(排列在西班牙语、法语后,和德语时常持平)。我所在的杜克大学社会学系20余名教授中,专门研究中国的资深教授就有5位。

以上提到的文化研究、传媒、中国研究这三个领域,就是我近年来的“游击区”。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这三者,堪称幅员广阔(如文化研究),或有形(中国)或无形(文化研究)的空间。对我来讲是由中国为轴心,其他两者为场地,让我在三边来回游弋。涉足传媒也必然沾上些实际应用的事情,如这些年来跟美国和中国传媒均有不少接触。无论是在媒体上应邀受访,还是为传媒业界和政府新闻发布部门提供信息和服务,跟在书斋里埋头著书立说,亦或在校园里课堂上侃侃而论,其间差异颇大,也使我近年的日子忙碌而多彩多姿。我最近几年频繁回国,每年平均在国内的时间超过了四个月。也算是一种两岸(太平洋)三地(文化研究、传媒、中国研究)的一种游走方式吧。在国内课堂和会议上用中文常常讲到的话题,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走



向、知识界的潮流与趋势。这也是我时时关注思考的话题,只是在美国用英文写作与讲课发言时,涉及这些话题时多半要从中国话题切入,反倒不如在国内讲这个话题放得开,可以畅开来谈自己对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潮的看法。

本书的编辑也按照以上的轨迹,以中国为主轴,分别以美学、文化研究、传媒、西方学术观察几个方面,辑录起零碎散撒在各方的文字。我早些年是从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起点,来思索中国 20 世纪百年来的现代化历史道路。在纷乱芜杂的历史资料中,企图以较为抽象而又不失历史根基的思路,来管窥那一段至今仍然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遗产。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意义不亚于数千年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遗产,可以称之为现代的传统。我从来就相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对那个现代传统的思考都落实在对当代中国的关注。我把这部分关注放在第一部分,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把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其实我是想谈一点思想史)的部分放在首位,也就是要强调当代中国这个“主旋律”。当代中国与全球化的问题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年一直将其作为关注的核心。所以拉杂写了不少文字,不过多半是废话空话,留在这里的,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品,只是些浅尝即止的片断速写。在谈及西方的时候,我也无时不在想象中国、感受中国(有半年在感受,另外半年在想象,同时在讲述和分析)。这一点在观察西方学术的部分文字里可以看出。

从 90 年代中期起,我开始跟大学时代的几个同学一道,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传媒上,具体说是美国传媒当时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由此出版的一本畅销书把我也拖进了传媒的领域,从此一发不可收。这部分讲传媒的文字不少是谈话、对话和访谈录,游离学术论文越来越远,也愈发肤浅,不过倒是很鲜活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绪和感受。如果把这些访谈式文章跟谈论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论文相比较(那组文章中谈“文化革命”、毛泽东与阿尔图塞的那篇,并不是在讨论历史上存在的文革,而是在讨论哲学的认识论和现代化战略),似乎可以觉察到我年岁不断见长,反而心气日渐浮躁的变化。这是就个人而论。如果就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实实在在是从“五四”以来的感时忧国的一代。当然更可以再往上推到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去,不过更确切地讲,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成长的血液情操中,浸淫了毛的教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无论我们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这种“关心国家大事”的情怀,难以改变。

中国的变化、全球化的趋势都是牵涉到亿万人的大事,也是由我们每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七情六欲的鲜活的个人的点滴小事组成的。我在本书里发表的这些大部分空泛、大而不当的看法,其实包含了种种困惑着我自己的问

题, 大大小小, 均无答案。在这个前言里, 我提出来跟我从事的职业关系最大的, 即学术模式、方法的问题, 不过是举例说明人生的困惑。历史的记忆日渐淡化, 都市里新起的摩天楼把旧日风景的最后残痕无情地抹去。但永恒的困惑恰如我们面临的生活本身, 也一如今天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承蒙周宪兄和南大老师朋友们的厚爱, 在母校南大中文系给研究生上课。本书也是在周宪兄的催促倡议下辑成, 由南大出版社的编辑同仁金鑫荣、赵庆等悉心修订问梓, 深感谢忱。南大出版社在 1985 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里, 收录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论文。二十多年过去了, 今天有幸由母校出版社为我出集, 幸福和感恩之情难以言表。鲁迅诗云: “雨花台边埋断戟, 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 归忆江天发浩歌。”

是为序。

2006 年 2 月 12 日 (丙戌年正月十五)

于杜克森林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篇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

一、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	
——刘康答史安斌问	3
二、对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的几点思考	18
三、90年代文化批评试谈	27
四、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意义生产	38
五、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的再反思	43
六、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54

第二篇 美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七、美学再反思	
——五六十年代美学争论的回顾	67
八、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不同选择	
——关于《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95
九、现代性不同选择与文化革命	
——毛泽东与阿尔图塞的理论思考	103
十、文化霸权与文化革命的谱系学	130
十一、美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李泽厚、刘康对话录	143

第三篇 当代西方学术观察

十二、当代西方思潮中的“新”与“后”	159
十三、萨义德和西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	171
十四、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	179
十五、当代西方学术趋势的观察：区域研究和中国研究	199
十六、对于中美社会科学交流的一些看法	202



第四篇 传媒与意识形态

十七、科索沃随想录	
——刘康与李希光的对谈	211
十八、信息时代的意识形态	
——课堂上的争论	223
十九、全球化、媒体、意识形态的关系	
——兼论美国媒体近年来的中国报道	250
二十、国际传播对中国报道的“话题设计”	
——兼论美国媒体对“法轮功”事件的报道	261
二十一、全球新传播与突破旧宣传	
——与李希光对谈录	267

第一篇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

一、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

——刘康答史安斌问

史问：近几年来，全球化问题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你在中外学术刊物和媒体上多次谈及全球化问题。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你曾提出全球化与文化想象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一个大语境。在探讨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之前，你能否从总体上再描述一下全球化？

刘答：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是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最密切的。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应该反复强调，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和文化讨论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谈，都无法与全球化的语境分开。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world-system)，同时也指通讯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这四个层面上来把握“全球化”的涵义。从政治上说，“全球化”是指后冷战时代政治格局的重组和世界系统的建立。经济的全球化是指现代化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即60年代末以来，原有的大规模重工业生产和高度集中的管理转变为分散的、零散和多国的生产与管理，也就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社会意义，主要是指全球性的社会整合与分化。跨国资本、跨国公司造就了新的跨国资产阶级和高科技白领，形成社会阶层的新整合。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的分化和解体。但很显然，社会整合有利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中的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却日趋严重。在文化上，全球化也形成了特定的逻辑。

问：所谓的全球化文化逻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全球化文化逻辑具体来说，就是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商品的“文化化”和文化的“商品化”。非文化性商品（如一般工农业产品和消费品）的“品牌性”、广告性也即文化、符号性越来越重，信息时代的信息商品、文化商品（如传媒、影视、电脑网络等）更是当代社会的重头商品。当然，文化产品的商业性也无处不在。过去的所谓“现代主义”的非商业性精英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线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的商业制作、商业包装，渗透到一切文化活动与机构，包括神圣的教会神坛、精英荟萃的学府殿堂。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再



就是全球化造成了文化巨大的悖论。悖论的一面是文化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层面,从牛仔裤到摇滚乐,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与追求流行全球。苏联东欧解体后,“市场万能”的神话渐渐成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悖论的另一面,就是文化的多极化、多元化以及分裂分离的趋向。这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新崛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东亚模式”、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西方近年来“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多样性(diversity)和“差异”(difference)论流行,种族、性别、性取向方面的各种小团体与利益集团的呼声日益升高,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文化多元化的趋向。

“全球化”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回顾

问:1998年岁末,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隆重纪念了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可不可以说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肇始自二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呢?

答:依我看恐怕应该更早一些。前面提到,全球化的趋势发端于6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回应,但是是以某种“反全球化”的姿态出现的。毛泽东提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并提出世界性的“农村(第三世界)包围城市(第一、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霸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对抗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及中国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广交朋友、无偿援助,都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回应。不过,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反全球化”的立场多半停留在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层面,并未深入到政治、经济的层面。当时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经济上主张自力更生,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脱轨”(delinking)。在意识形态上则采取了相当激进的立场,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革命的矛头指向“美帝”和“苏修”两霸,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但是实际上这些激进的主张并未产生什么效应。根本原因是中国当时缺少真正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中国的反全球化的立场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影响却不可低估。中国文革时期的激进主义对西方思想界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批判理论,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与六十年代末席卷全世界的“文化革命”浪潮有密切关联。在当时,“毛主义”、中国文革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特别对西欧的知识界,对西方左派的影响很深。西方左翼知识界与毛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从1979年开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完全转变了原来的激进主义的立场,全面开放,以现代化逻辑取代革命逻辑。中国的领导和全社会都意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经济,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虚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反资本主义的理念都是空谈。因此中国在经济领域放弃了原有的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脱轨”战略,采取了开放市场、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政策。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逐渐放弃了激进主义、道德理想主义,而强调“实事求是”,即实用主义的立场。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全球化大潮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冲击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全球化与中国八十年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

问:八、九十年代在全球化大潮裹挟之下的中国,由单一的革命话语进入了充满了“对话的喧声”的时代。你可否谈谈全球化对中国当代话语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答:中国当代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话语上,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来分析:官方话语,知识精英话语,民间与社会话语。官方话语很清楚,《人民日报》第一版和各种政治报告、文件等等,都是官方话语。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从80年代开始,越来越凸现与官方话语的距离,越来越多元,公开发表的场所也越来越多。民间与社会话语是指不同于前两者的话语,如大众文化、影视娱乐、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男女等等。现在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比较清晰。

我们可以先谈官方话语。今天的官方话语,基本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体系。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根本特色是意识形态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阶级斗争,绝大部分都是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所以,当时的话语体系反映了这种重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当然,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治国的方针是完全放弃了,但过去的话语形式却并未根本改变。这当然也是处于维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的需要。现时官方话语的内容与毛泽东时代大相径庭,但形式上的区别却很少。对于基本国策的表述与阐释,所用的话语有不少“数字化”的成分,很生动有力,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跟毛时代的话语形式一样。再比如大量使用箴言和箴言式的话语方式,大量的排比句式、宏大和铿锵的词语等,始终是重要政治演讲、公报、社论的话语“主旋律”。

问:最近上海一家报纸评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最有影响的十句口号,有不少就是你说说的这几类。“时间就是金钱”是箴言式的,还有“基本路线一



百年不动摇”等。你提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体系,能否具体分析一下?

答:毛泽东所构建的革命话语体系,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它是反传统的,主要表现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儒家文化。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资源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非正统的、非主流的、民间的那一部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了解毛泽东话语和文化资源的重要文献,值得细读,并且从其话语结构上作详尽的分析。毛在文中提到中国农村社会的族权、宗法制度,还有我们用现代化话语界定的所谓“迷信”如民间宗教、土地庙、关帝、灶王爷等等。毛一方面说农民革命推翻了一切“封建”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这些又显示了高度的兴趣。另外,毛受了洪秀全的很多启示,主要是洪秀全如何把西方的东西本土化、中国化。其次,毛泽东对五四新传统的态度比较矛盾。他的革命理论当然是来自五四启蒙理念。他基本认同五四新传统中包含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维,对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进化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和决定论等等,毛基本都是接受的。但毛始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和现代性方案持怀疑态度,包括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知识分子。另外,他对历史决定论也是半信半疑,有时拒绝,有时赞同,全看场合和具体条件。对于西方理论体系与中国具体实践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毛泽东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的革命话语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强调矛盾的体系,一个注重实际效用的体系。毛自己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概括他的思想,是颇说明问题的。

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这个“民族形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中国本土内部非传统的东西与西方话语体系中间既反传统、又反现代性激进的东西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本身产生于西方,既是启蒙理性的一部分,又有辩证、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的激进与浪漫部分,有许多人文情愫,有许多美学关怀。毛泽东的话语也是浪漫的、审美的。当然,他的理论和实践中许多无情的、工具性的东西,往往与其审美与浪漫的东西并存,使得“毛话语”非常矛盾也非常复杂。毛泽东把中国传统的和西方的激进话语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革命话语体系。因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西方现代性和“启蒙理性”的要求来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近来很流行把毛泽东思想当成封建的东西来批判,不少人说毛泽东的中国现代性方案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西方“中国学”专家们则强调毛与中国封建帝王的渊源、与中国封建传统的渊源。这种观点在80年代的中国也非常通行,但我以为这些看法比较简单化。毛泽东并非是反西方、反现代